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中文系

德之贼也：孔孟之“乡原”探索

科目编号： ULSZ 3068

学生姓名：蔡慧满

学位名称：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老师：林志敏 师

呈交日期：2013 年 4 月 5 日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目次

题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iv
前言	1
一 研究背景.....	2
二 研究动机	3
三 研究价值	3
四 研究难题	4
五 文献纵述	5
六 研究方法	6
第一章 孔孟学说中“君子”与“小人”的真谛	
第一节 “君子”与“小人”的原始意义	7
第二节 儒家的“君子”与“小人”	10
第三节 “君子”与“小人”内涵演变的缘由	14

第二章	“乡原”	
第一节	“乡原”的起源与内涵	18
第二节	孔子对“乡原”的态度	22
第三节	孟子对“乡原”的态度	25
第三章	“乡原”与儒家思想	
第一节	“乡原”与“中庸”	29
第二节	“乡原”与“权变”	34
第三节	“乡原”与“狂狷”	37
第四章	“乡原”与“小人”与“君子”	
第一节	“乡原”与“小人”	41
第二节	“乡原”与“君子”	44
结语	47
参考文献	49

德之贼也：孔孟之“乡原” 探索

宣誓

谨此宣誓“本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或电子资讯，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10AAB05617

日期：2013年4月5日

摘要

孔子对“君子”及“小人”做了较多的叙述，还提出了许多对“君子”的要求。

《论语》里谈论“君子”之处极多。虽然较少论及“小人”，但也刻画出了鲜明的“小人”形象为何。介于两者之间的“乡原”却很少提及，孔子只以只言片语带过对“乡原”的看法，似乎不屑提及“乡原”者。提倡有教无类的孔子，却唯独对“乡原”深恶痛绝，评论“乡原”为“德之贼也”。究竟“乡原”的内涵为何，与“乡原”到底带给社会什么影响，以及“乡原”与儒家思想范畴里有何相似之处，是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儒家思想范畴里有几处被认为是与传统“经道”不符的，例如“中庸”、“权变”与“狂狷”。这几个范畴与所谓的“乡原”又有何不同，亦是着重点之一。通过探讨儒家思想里“君子”与“小人”的真谛，衬托出“乡原”这种特殊情形。“乡原”介于“君子”与“小人”之间，他们的作为到底该如何归类，属于何种道德范畴？在最后章节，本论文将浅析“乡原”与“君子”及“小人”的不同之处，以及“乡原”在儒家思想里的道德范畴归属。

关键词：孔子；孟子；君子；小人；乡原

致谢

在拉曼大学求学的三年时间，转眼逝去。我们已经来到最后关头——撰写论文。从一开始的选题目，蒐集资料，到撰写过程，都花了很长的时间。过程中一直修改，甚至修到自己都有点头昏脑胀了。好不容易，终于敲定了定稿。

大学三年，让人成长不少。来到最后阶段，心里实在感慨万分。这份论文意味着我们与拉曼大学最后的学术联系。此外，论文也在我们未来的学术路线上占了重要的地位。往后，自己修的相关课程，也许都和论文题目有关。总归一句，论文是我们大学三年里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本论文的完成过程，所用时间与精力实属不少。姑且不论研究成果如何，本人都想对父母、师长、以及朋友致以万二分的谢意。感谢父母的辛苦栽培，没有他们的付出，绝对没有今天的自己。感谢师长们的指导，是他们充实我们的知识。尤其感谢论文导师林志敏师的细心指导，与特地拨冗指引的苦心。感谢朋友们给予的精神支持，是他们陪我一起度过赶论文的时光。谢谢你们！

前言

在社会里，有各种各样的人。人们评论别人的标准也不一样，但是无论怎么不一样，似乎都离不开道德的标准。当然，所谓的标准也是因人而异，但是最少可看出在一个群体里，道德标准是人们给别人下定位的基本准则。

在古代的经、史、子、集中，有许多提及古人道德操守的文献，它们以各种不同的文体记载。或像是《论语》这种语录体，或像是《史记》这种纪传体通史、也有像《春秋》这种国别史等等。这些书籍中记载了古代人们的各种文化习俗、历史，乃至历代人们对他们的评价或意见。从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出道德标准如何影响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定位与名声。有时候，这些现象不会直接从文献中得出，不像数学公式般说一不二。他们混杂在历代书籍当中的各个故事中。或以历史，或以诸子的学说的方式呈现，让读者了解他们的那个年代。

此论文所依据的资料背景，多是孔子与孟子年代的记录。这些记录，记载了他们的言行，以及与他们同一个时代的其他人的言行举止。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只未淹没在历史的巨轮中，反而还时刻影响着今天的我们。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影响着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直到现在，人们还以孔子的标准，去衡量他人的做法是否正确。虽然，并非所有人都如此，但可从中窥探孔孟学说的影响力是如何的深远。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儒家思想就是其中一条支流。

人性这个课题，从古至今有无数人探讨过。自古有诸子百家研究，今天有哲学家在懊恼这个课题。然而，直到今天，人性仍旧是个难解而奥秘的人生

课题。在许多家学说中，孔孟的学说深深的影响了后人。无论怎么变化，大多数人对人性善恶的标准都与儒家的学说沾亲带故。

善与恶、黑与白，是两个极端的表現。往往人们看到的就是这两个极端的表現，也依据这个标准来评论他人。然而，却不断有人提出新看法，提醒别人在这两者之间还有灰色地带，不是非善即恶如此简单而已。从东方的游侠，到西方的罗宾汉，这种正邪混于一身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例子提醒着人们，看事情要兼顾两面，才不会以太武断的眼光去评论他人。这个社会的现实，也告诉了我们别人的眼光会带给一个人如何严重的影响，乃至他的整个社会地位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有鉴于此，本文想探讨的就是孔孟学说中的其中一个思想，即“乡原”。这是孔孟思想主张的其中一个针对人性的范畴。

一 研究背景

人性的表现，与所处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环境可以深刻的影响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处世甚至品格。本论文所研究范畴的背景，正是一个纷乱而无秩序的历史背景。春秋战国动乱的年代，造就了诸子百家争鸣的景象。在那个使人对人性价值观产生疑问的时代，值得我们去探讨其中一些奇特的人性表现。

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与代表人物，提出了许多主张，希望振兴当时趋向崩裂的礼仪制度。在他提出有关“君子”与“小人”的看法中，对“君子”的要求颇多。这是因为他希望借助影响周遭的人，把他们塑造成尊崇礼制的人，以挽救腐败的社会人心。“小人”是他对那些道德品德上有缺陷之人的称呼。《论语》里也提出了不少“小人”的德行。

二 研究动机

自古以来，人性课题就一直是各家所探讨的热门话题之一。从西方的柏拉图，到东方的孔子，无不对人性的表现提出了各种主张与意见。以中国历史背景为例，孔子提出通过教育改变人性，传承到孟子、荀子。孟子的“性善论”以及荀子的“性恶论”都是以孔子的思想为基础，进一步加以阐述并注入新观念。

在《论语》中，提到“君子”之处极多。与“君子”相对的观念既是“小人”。然而，对于介于两者之间的那种似是而非的“乡原”却极少提及。纵观整部《论语》，孔子只对此课题做出了一句评论，即“德之贼也”。直到孟子手中，才对“乡原”有了稍微多一些的阐述，但是与“君子”或“小人”相比，“乡原”的概念与内涵可说是极其模糊的。

有关“君子”的内涵，如仁、义、礼、智、信，在《论语》里占了颇多章节。学术界中对“君子”的研究也可谓不胜枚举。以“小人”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比起“君子”而言，相对较少但也不乏其数。然而，以“乡原”为课题的学术研究与前两者比起来可说是少之又少。这种现象促使了笔者想要研究“乡原”这个课题，也因而成了本论文的研究动机。

三 研究价值

在研究动机里曾提到，对于“乡原”的研究少之又少，因此本论文的研究价值就在于此。若继续研究一个已被许多学富五车的学者研究过的课题，则

显得毫无创新之举。在儒家思想这个范畴里，较为人知的即孔子的“仁政”与“君子”观。

就“仁政”而言，已有许多学者在期刊或是论文中发表过相关课题研究。“君子”的学术研究，更是整个儒家思想研究的主要对象。在众多研究成果中，其中有许多声望高，学问深的前辈学者。他们通过各种研究方式，可说是把这两个课题揣摩、研究至淋漓尽致。

尚是学术研究领域中新手的笔者，不敢与前辈们品高论低，因此选择了“乡原”这个尚不多人研究的课题。笔者不敢自称本论文已把“乡原”的内涵以及相关的概念解释得十分清楚。无论如何，笔者希望通过对“乡原”的探讨，能够对这一个较不为人知的人性课题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时，笔者也希望能够稍稍安慰自己，即本论文还有些许研究价值，不至辱没了在大学里三年的学习时光。

四 研究难题

针对研究难题，在完成论文后，笔者总结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共得到三个难题。其一，《论语》里对“乡原”的内容只有唯一的那么一条章句。《孟子》里虽然有较多一点的阐述，然而原文资料实属稀少。故笔者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多方面的从其他的原文章句去探讨，进而论证有关“乡原”的课题内容。

其二，关于“乡原”的研究论文，笔者只找到少数。原因是极少人研究此课题，甚至找不到相关的专门书籍。这使得笔者必须回到原文，从原文中以及后人的注释里去寻找所需要的资料。

其三，在资料缺少的情况下，笔者虽然依旧可以做出研究成果，但相对而言则困难许多。在此课题中，有些疑问只能指出但不能回答。这是因为不论是《论语》或是《孟子》的原文中，还是后人的注释里，都没有相应的答案提供。笔者因而被迫在某些观点上，提出疑问但无法提供相关答案。

五 文献综述

在研究过程资料文献方面，笔者主要的方向锁定在原文章句，即《论语》与《孟子》，其次则是后人对这两本著作的注释。此外，笔者也引用了少许的期刊论文，通过这些文献来研究“乡原”课题。

有关文本引用方面，笔者主要以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十三经注疏》为主，而在引用注疏时，则参考《十三经注疏》里的众多学者理论，以及南宋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此外，笔者也参考了清代学者刘宝楠以及焦循，二人考据学方面的知识，以及他们对原文的补充注疏。

在提供有关社会背景资料的时候，笔者尽量引用较可靠的学者或是公认的专书作为依据。其中所引用的学者专著，就包括了余英时文集的《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的《中国古代史纲》。

至于在期刊论文方面，笔者引用了《东岳论丛》学刊里的论文，即葛荃所作的《作为政治人格的狂狷——乡愿与伪君子》以及熊燕华的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孔子的君子观探析》。这些期刊或论文的研究范畴或许较为狭小，无法为所研究的课题提供极完善的资料补充，但笔者在搜索资料的时候已尽全力，若有不尽之处，也是无奈之举。

六 研究方法

笔者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三个，即诠释学方法，社会历史研究，以及训诂学。在研究过程中，笔者主要以回归原文的方式，再以后人的注疏为主，尝试以诠释学的方法来呈现所研究的课题。诠释学包括了三个步骤，即理解、解释及应用。笔者通过阅读、理解原文，在加以古人的践注研究，尝试解读原文。接着，把解读出来的含义，引申应用到后头的义理阐述。

其二为社会历史研究，在研究“乡原”这个范畴时，笔者也特别研究了它背后的产生背景及当时的社会状况。通过对背景知识的掌握，试图结合社会历史以及人文现象。

其三则是训诂学，此方法属于语言研究。在解释重要名词时，笔者会引用文字学方面的资料。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及清代段玉裁的注，是笔者研究文字方面的依据。此外，在一些清代学者的注疏如《论语正义》与《孟子正义》中，也有不少考据学的资料，这些资料也是笔者的研究依据来源。

第一章 孔孟学说中君子的真谛

孔子的言行与主张大多记录在《论语》里，而《论语》里提到君子之处又极多。然而就人们所知，“君子”一词最先是不具备道德意义的，而“小人”也只是地位高低的代表名词。本章主要探讨“君子”与“小人”的原始意义，同时稍作总结儒家的“君子”与“小人”之意。此外，“君子”与“小人”之内涵演变的缘由，也是本章的讨论课题之一。

第一节 君子与小人的原始意义

《论语》中有许多提到君子的地方，其中不乏把君子和小人并谈之处。在孔子以前，君子与小人原本代表了人们在社会上的身份地位。他们按照等级的顺序排列，从高至低。彼此间遵守着严格的阶级制度限制，维持了西周的社会体制。这种以血缘为枢纽的制度，维持了很久，直到西周末年才开始出现崩裂的现象。

周王为天下的大宗，其嫡长子为宗子，是王位继承者；庶子为小宗，周王以其政治权力封之为诸侯。诸侯、卿大夫、士各为本支的大宗，其嫡长子为职位继承者；庶子为小宗，再分封。（张传玺主编，2004，页 67）

由以上引文，我们看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依血缘而分嫡庶，组成了整个社会的体系。这个由血缘为基础的社会体系，是十分严谨而完整的。

余英时曾指出，“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君子”最初是专指社会上居高位的人，后来才逐渐转化为道德名称的；最初是少数王侯贵族的专号，后来才慢慢变成上下人等都可用的“通称”的。”（余英时，2004，页 139）从引文中，我们可看出君子原指由血缘所构成的身份意义。换言之，只要是贵族阶层，都可称为“君子”。

余英时亦指出，“下层庶民纵有道德也不配称为“君子”，因为他们另有“小人”的专名。”（余英时，2004，页 140）小人原本指的是身份地位低的人，是与君子相对而言的。

从解剖文字的角度来看，在文字最初欲表达的意思里，君与小的意思只代表了身份地位的不同。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1981，页 119）从文字来看，上古的君字，结构是从尹从口，口代表是发号施令的人，尊也，代表地位崇高，比别人不同，也就是所谓的贵族人士。小，物之微也。从八丨，见而分之。（[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1981，页 104）许慎的意思十分明显，小的意思即是与大相对，形容物体体积微小。

从中，我们可知道“君”指的是古代社会中的贵族；“小”含有卑微之意。“小人”即身份低下之人。高高在上的君子（贵族），或是卑微小人（平民），并不含道德含义上的褒贬。

以下举几个君子与小人在《诗经》中的含义，以进一步证明他们的原始含义。

坎坎伐辐兮。寘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诗经·魏风·伐檀》（程俊英、蒋见元，1991，页 300）

这是一首讽刺剥削者不劳而获的诗。（程俊英、蒋见元，1991，页 300）描述了农民们的辛劳，并嘲讽了无需劳动却坐享其成的在位者。在此处，君子就被用来当成是贪鄙的在位者。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亿”正面指控了在位者的贪鄙，他们高高在上，等着下层百姓的侍奉。此句是正面指控，而“彼君子兮，不素食兮”是反问句，藉此反问那些居高位的“君子”，讽刺他们在位却不付出，白吃食的卑鄙行为，为人所不齿。

“一正一反，一热一冷，这种前后迥异的艺术手法正适宜表现阶级对立的思想内容。”（程俊英、蒋见元，1991，页 300）所谓的阶级对立，就是指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冲突。贵族，即“君子”，他们的社会地位崇高，与道德修养并无关系。职是之故，可看出君子在上古书籍中的原始意义。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

君子于役。苟无饥渴。——《诗经·王风·君子于役》（程俊英、蒋见元，1991，页 197）

这是另一首妇女思念远在他乡的丈夫所作的诗。王先谦集疏：按据诗文鸡栖、日夕、羊牛下来，乃家室相思之情，无僚友托讽之谊。所谓君子，妻谓

丈夫，序说误也。（程俊英、蒋见元，1991，页 197）这是王先谦纠正《毛诗序》的说法，澄清了这是一首纯粹妻子思念丈夫而非政治托讽诗，同时也清楚表明了，君子乃是妻子对丈夫的称呼。在这首诗中，“君子”是对古时候男人地位的尊称，并无道德含义在内。

在当时，阶级制度是十分重要且不能混淆的。周代，尤其是西周，整个社会建构在一个由血缘组成的严谨结构上。由尊到卑，卑微的贱民有义务服侍君子。瞿同祖在《中国阶级结构及其意识形态》中就表示，贵族阶层被称为“大人”，“贵人”或“君子”，与“小人”称为对比。君子不仅地位高，而且期待着被“小人”尊崇和供养。这就导致了主从关系。（费正清编，2008，页 251）由西周时期至东周初期，君子与小人的关系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直到了春秋末，孔子才奠定了他们新的内涵意义，并一直沿用至今。

第二节 儒家的“君子”与“小人”

至今，人们都用君子与小人来区别道德上的差异。这是孔子赋予“君子”与“小人”的新含义。这一思想，随着儒家思想的传承，生生不息，直到今天。以下举几个例子，浅析君子与小人间的不同。同时探讨在孔子眼中，“君子”和“小人”到底有了怎样的新面貌。

在《论语》中，有几处是孔子把君子与小人并谈的。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篇）（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论语注疏，1999，页 50）孔颖达的正义解说为：“君子执德不移，是安

于德也。小人安安而不能迁者，难于迁徙，是安于土也。君子乐于法制齐民，是怀刑也。小人唯利是亲，安于恩惠，是怀惠也。”（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论语注疏，1999，页 50）

孔子这段话，说明了君子与小人所安之不同。君子唯德是从，坚守不移，所以安于德；小人安于物质的享受，不肯轻易离开所居之地，因此安于土。君子乐于见到法律的推行与百姓的遵从，因此心里不惧怕法律刑罚。小人只想到从中获得利益，希望时时刻刻都得到恩惠，因此怀惠。君子不眷恋物质，只追随德之所在。小人依赖物质且惧怕刑罚，期待恩惠。因为只有做错事的人才会惧怕刑罚，否则只要执法公正，刑罚再严酷也无需害怕。

至于有关利益得失方面，孔子就曾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篇）（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论语注疏，1999，页 51）关于此句引文，朱熹就曾注道：“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宋]朱熹，2011，页 72）

从朱子的注中，可看出君子遵守的是符合天理道德的“义”，小人则喜于遵从人的“私欲”。朱子虽未进一步说明，但从字里行间可得知私欲即人对物质的贪欲，为了达到目的，“小人”就不会理会仁义道德。反观君子却能恪守私欲，遵守社会的伦理道德。这是君子与小人的差别，也明显看出两者之异已不再是身份之别，而是人格之别了。

关于如何从外观看“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差异，孔子这样认为：“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篇）（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论语注疏，1999，页 99）清代刘宝楠对“坦荡荡”与“长戚戚”就解释为“君

子坦尔夷任，荡然无私；小人驰兢于荣利，耿介于得失，故长为愁府也。”

([清]刘宝楠, 1990, 页 284) 南宋程子则如此注释：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于物，故多忧戚。([宋]朱熹, 2011, 页 98)

从以上两个注解，可得知儒家的君子守礼，坦然面对一切，因此坦荡荡。“小人”则一直忧心于物质的利益得失，故常计较而导致忧心忡忡。无论是南宋的程子还是清代的刘宝楠都把“小人”的“长戚戚”解释为“荣利”或“物”，也就是说“小人”为物质所役，时刻想着得失，因此患得患失。相反的，“君子”因为没有对物质上有所求，只追随天理，所以也就无欲则刚了。所谓相由心生，一个人的心态往往会呈现在自己的面貌上。孔子就指出了“君子”与“小人”在外表上给人的感觉有何不同之处。

“君子”的品德良好，“小人”则相反。要维持社会秩序，是否应该以刑罚来对付小人？在以下的对话中，孔子就表明了他的态度。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

“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篇）（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论语注疏，1999，页 166）

刘宝楠在注释时表示：“亦欲令康子先自正。偃，仆也。加草以风，无不仆者，犹民之化于上。”（[清]刘宝楠，1990，页 506）季康子欲杀无道之人以维护道义，但孔子就以反问的方式否决了他的说法。言明百姓之善与否决定于自己。

“君子”的德行就如同风一样，而“小人”的德行如同草。想要征服草，就只有成为风，吹过草，使草低头驯服。君子想要达到目的，只有先正其身，然后才能影响他人。一味靠杀戮是维护不了德的，故孔子反对杀人，无论是“有道”还是“无道”之人。此例，恰好表明了“小人”是可以驯服的，但要靠“君子”的德风来感化，因此君子欲正人，首先就必须正己，这是孔子对君子的要求。

“君子”内涵的演变年代久远，久不可考，但我们却可以得知，是孔子奠定了他的新涵义。

君子之逐渐从身份地位的概念取得道德品质的内涵自然是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大概在孔子以前早已开始，但却完成在孔子的手里。

(余英时，2004，页 140)

孔子以来的儒家是把“君子”尽量从古代专指“位”的旧义中解放了出来，而强调其“德”的新义。(余英时，2004，页 140)

同时，我们也可归纳出这样的总结。“君子”与“小人”已不再是身份象征了，他们成了道德标准的代表。

论证了“君子”与“小人”的不同，以下来探讨一下孔子对君子、小人身份的看法。孔子十分注重“君子”的修养，他把品德操守看得比出身来得重要，也因此给予了君子、小人新的含义。那些身份卑微的君子，学者李零是这样描述他们的：

从社会底层走出来，成为一种新兴的力量。他们不但比当时的贵族更有知识，还有他们绝不具备的底层经历。他们对上流社会，可能嫉妒艳羨，一心想取而代之…，但也有一些人，古道热肠，留恋过去，一心想挽救衰败的世风。（李零，2008，页 217）

由于传统封建制度的衰败，知识开始外流。不再只有贵族能够掌握知识，因此那些原本身份低微的人也开始出头。他们看不起好吃懒做，享受特权的贵族，想要取代他们。以实力证明自己，而非是以出身来炫耀。正是因此，在百家争鸣的年代里，身份不再是诸子所执着的重点了。他们极力以自己的方式来表现，希望能够改变那个战火连年的年代。不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只要他们的政策被君王所认可，都有出头的机会。

第三节 “君子”与“小人”内涵演变之缘由

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里，臣弑君，卿取代诸侯，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孔子就曾经表示对鲁国陪臣季桓子的不满。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篇）（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论语注疏，1999，页 28）孔颖达的《正义》里是如此注释的：桓子用此八佾舞于家庙之庭，故孔子评论而讥之。（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论语注疏，1999，页 28）

季桓子只是陪臣，竟敢使用天子所才能享有的八八六十四人舞蹈，证明礼乐的规矩荡然无存。孔子因而讥讽他。在礼乐的运用中，礼与乐不再互相符合呼应，而是成了诸侯们用来为自己增添荣耀的工具，原本只属于天子规格的

舞蹈，现在却被区区陪臣拿来当成娱乐。这样的情形比比皆是，更过分的甚至有子弑父，臣弑君的情形。社会秩序一片混乱，有志之士如孔子等人因而纷纷提出各自的看法，希望改变时局。

通过以下对话，可探知孔子对当时执政者的看法。子贡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子路篇）（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论语注疏，1999，页178）《正义》里是如此注释这句引文的：“噫，心不平之声。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孔子见时从政者皆无士行，唯小器耳，故心不平之。言不足数，故不述其行。”（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论语注疏，1999，页179）

子贡意欲探知孔子对于当时从政者的看法，但孔子只以一句“何足算也？”带过，根本不屑一谈。在他看来，当时的一些在位者未必就是有德的君子，被统治者役使的未必就是无德的小人。换句话说，统治者很可能就是小人，而被统治者则也有君子在。（熊燕华，2007，页6）对孔子而言，那些统治者根本不具备为臣者所必须有的条件，在他眼里根本不算什么，不足以拿来谈论。从这个例子，可知孔子对当时的时局是多么的不满。那些在其位，却不谋其政者，为整个社会带来了许多不安与动荡。

孔子极其注重礼乐制度，他曾说过：“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季氏篇）（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论语注疏，1999，页224）白虎通诛伐篇：“诸侯之义，非天子之命，不得动众起兵。…盖礼乐征伐，皆黜陟之大权，所以褒贤诛不肖，天子之所独操也。此惟治世则然，故曰：‘天下有道’。及无道之时，上替者必下陵，礼乐

征伐，不待天子赐命，而诸侯辄擅行之。或更国有异政，僭上无等，虽极霸疆，要为无道之天下矣。”（[清]刘宝楠，1990，页 652）

兵者，是大事，非要事不能随意发动战事。在维护正统的情形下，只有天子有权力发动战争，以对诸侯们进行赏罚。即使是诸侯之间有战事，也必须是出自天子的号令。然而，在当时“无道”的时局里，诸侯们之间擅自征伐，或是自行处理国中的大事。这已经严重违反了阶级制度里的规定，“三家分晋”就是属下僭越，以下代上的例子。及至更严重的时候，就像由家臣代理国中大事，就如鲁国的季氏把国事交给家臣阳虎来处理。这些在孔子眼里，都是无法容忍之事。

在《孟子》一书中，曾经描述了那种不道德的行为。“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离娄篇）（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一）孟子注疏，1999，页 202）焦循如此解释孔子看待这种情形的态度：“孔子弃富不仁之君者，况于争城争地而杀人满之乎。此若率土地使食人肉也。言其罪大，死刑不足以容之。”（[清]焦循撰，1987，页 516）

那些不仁之人已被孔子所鄙视抛弃，更何况是那些乱伦理，以下犯上的乱臣贼子。他们以杀戮来满足私欲，草菅人命。孟子给予他们严厉的批评，即死罪都不足以弥补他们的罪过。从中也可看出孔子与孟子是如何地讨厌那时候的社会状况，那个因礼乐制度崩裂而失去秩序的社会。

孔子出身于没落的贵族，有心为政却无能为力。在漫长的周游列国后，他无功而返，最终投身教育。他有感世风的败坏，而提出君子与小人理论。他

不只提出与过往不同的君子小人理论。与此同时，他也为维持社会设定了许多标准，希望那些被他影响的人能够遵守这些准则，以达到平息社会动乱的目的。

孔子不断作出理性判断和分析，不断赋予君子所应具备的人格内涵，提高其人生境界，使之能成为理想的君子人格。他也希望通过君子这一形象来感召和感化他人，为社会培养出更多的君子。（熊燕华，2007，页 6）与“君子”对立的就是“小人”了，这两者构成了乱世中的主要两种人物。克己复礼，进而成仁的就是君子；贪于物欲，不择手段的就是小人。人心难料，不只是只有这两种一目了然的人物。有人是君子，有人是小人，但也有人口称君子，实是小人；有人看似小人，实则君子。处于君子、小人两个极端人物之间的灰色地带，该归类于何种类型则尚有待商榷。

第二章 “乡原”

在第一章里，探讨了“君子”与“小人”的意义，然也得出结论这两者之间尚有一个灰色地带。这个灰色地带，孔子与孟子，称之“乡原”。此章节将重点讨论“乡原”的起源与内涵。与“君子”有些距离，却非“小人”，孔子与孟子对这类人的批判，即为本章的主题。

第一节 “乡原”的起源与内涵

人心叵测，不是所有人都以真面目示人。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一面，与实际上的内心可能差很多。就如今而言，那些表里不一的人，被称为假道学或是伪君子。伪君子，成了他们的统称，在儒家里则被称为“乡原”。这个说法的起源以及在儒家里的解释是怎样的，就成了探讨的课题。

在《国语·齐语》里，曾经说过古代是如何处理地方制度的。其中就分为里、连、乡等。“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曹建国、张玖青注说，2008，页 190）《管子集校》里，则曾经这么指出：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郭沫若，1984，页 511）这个分法是春秋时期齐国管仲的主张。从引文中，可推算一乡有 2000-3000 家人，大概是一个小城镇的规模。

“乡原”一词，孔子曾下这么一个定义：“乡原，德之贼也。”（阳货篇）（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论语注疏，1999，页 238）朱子注：

“原，与愿同。乡原，乡人之愿者也。盖其同流合污以媚于世，故在乡人之中，独以愿称。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乱乎德，故以德之贼而深恶之。”（[宋]朱熹，2011，页 167）

“愿，谨也。《咎繇谟》曰：愿而恭。”（[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1981，页 897）孔子对“乡原”这样的人，只做了短短一句的评语。原，是愿的通假字。“愿”在《说文解字》里的解释为小心谨慎，恭敬的样子。从中可理解“乡原”即一乡里面，最得到大家喜欢的那一个人，因为他小心处世，恭恭敬敬的样子，从来不会得罪任何人。然而，这类人却不是圣人眼中的“君子”。

一个人之所以被喜欢，只是因为他懂得顺应大多数人的意愿。如果他的所作所为，却混淆视听，那就值得注意了。他不是君子，却表现得像君子；他本是小人，却不像小人。这种披着羊皮的狼，在孔子眼里是比小人更可恶的，因此谓之他们是“德之贼”。人们被他们的行为所蒙蔽，搞不清楚真正的“君子”所具备的特质。这也是为什么孔子非常不喜欢伪君子。“贼，败也。段注：败者，毁也。毁者，缺也。左传。周公作誓命曰。毁则为贼。又叔向曰。杀人无忌为贼。”（[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1981，页 1108）从文字学的角度来分析，“贼”是败坏的意思。孔子把“乡原”称为“德之贼”，即有把他当成是道德的败坏之意。“乡原”使人看不清真正的道德标准，他们迷惑了众人的眼光。孔子因而把他们看作是败坏道德的社会污点。

子贡曾问孔子说若他做到全乡人都喜欢，那么他是不是好人。孔子回答：未可也。子贡继续询问，如果做到：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孔子

认为应该做到：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原章句见子路篇）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论语注疏，1999，页 179）

朱子对孔子的回答进一步解释说道：“一乡之人，宜有公论矣，然其间亦各以类自为好恶也。故善者好之而恶者不恶，则必其有苟合之行。恶者恶之而善者不好，则必其无可好之实。”（[宋]朱熹，2011，页 139）

一个人如果所作所为，都被所有人接受且喜欢的话，是不合乎情理的。好人或坏人都喜欢他，那么其中必定有隐情。好人与坏人都讨厌他，那他必定毫无可取之处。自古正邪不两立，如果能够讨好双方，那么所使用的手段也大有问题。这是因为这个人不明示是非，所有的问题似乎都模棱两可，因此面对好人时他能够取悦他们；面对坏人时，他也能够谄媚于他们。那这种人格，是不可取的，即使表面上看来，大家都喜欢而接受他。孔子因而提出，与其有这样的人，不如能够做到好人喜欢他，坏人讨厌他。这样的人立场明确，所作所为必须是符合公道的，好人才会喜欢他。至于坏人，知道自己从他那里得不到什么好处，也就自然而然的疏远他了。

《孟子》里也曾经提出乡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尽心章）（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一）孟子注疏，1999，页 406）焦循把这种行为解释为“志同于流俗之人，行合于污乱之世，为人谋，居其身若似忠信行其身若似廉洁为行矣，众皆悦美之，其人自以所行为是，而无仁义之实，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也。无德而人以为有德，故曰德之贼也。”（[清]焦循撰，1987，页 1031）

这种似是而非，八面玲珑者，看似春风得意且受到欢迎，但对于孔子或孟子而言，他们是大恶之人。行为看似忠信，做事似乎廉洁，以为自己是正确者而沾沾自喜，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真正的仁义，因此孟子不把他们归类在仁义之士里，反而加以痛斥。

“乡原”与君子交往则逢迎君子，标榜仁义道德；与小人结交则唯利是图，狼狈为奸。学者葛荃因此认为：在孔孟儒家看来，所谓乡原这看似忠信廉洁，无可挑剔，其实最会同流合污，寡廉鲜耻，乱德害道。乡原人格表现的似是而非颇能惑众，故而最为孔儒一脉所厌恶。（葛荃，2008年11月（第29卷/第6期），页135）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篇）（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论语注疏，1999，页99）这两种人物，一目了然，让人无非是亲近或是远离。如果是那种表面道学，暗地里小人心的伪君子却让人防不胜防，且随时会被暗算。基于这个缘由，孔子与孟子才特别强调这种人德性的败坏，以警惕世人。

“乡原”究竟如何产生，《论语》与《孟子》里并没有说明。然而可以推测的是就“乡原”所表现的态度来看，他们应是一群追求名利或为求自保的人。他们所处的年代，是一个逐渐堕落的社会，有些人为了实践他们的目的，在生活中不择手段，与此同时却不想被套上“道德犯罪”的枷锁。于是，他们表面上维持了君子的风范，甚至从“君子”那里，偷来了一些标准行为，以模糊世人的视线。耍些障眼法，使自己看起来像是“君子”，然后暗地里行不光明的行为，从中获取利益。

第二节 孔子对“乡原”的态度

“乡原”有些地方与“君子”相似，然而大部分行为却类“小人”。那么孔子到底是否接受“乡原”？因为它并不完全是“小人”的表现。以下即将探讨孔子对“乡原”的态度，以及他对与理想“君子”有些距离的行为，有着怎样的态度。

“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乎！乡原，德之贼也。’”（尽心章）（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一）孟子注疏，1999，页405）依据汉代赵岐的注解为：“人过孔子之门不入，则孔子恨之，独乡原不入者无恨心耳。以其乡原贼德故也。”（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一）孟子注疏，1999，页405）

《正义》曰：小尔雅广言云：“憾，恨也。”（[清]焦循撰，1987，页1029）憾恨，指孔子的遗憾。遗憾人们不亲近他的学说，进而被影响。所有人孔子都认为是仍旧能够被挽救的，依旧有成为“善”的希望。《孟子》里曾提到：“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离娄篇）（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一）孟子注疏，1999，页221）对于孔子和孟子，几乎所有人都可以成为善人。惟有“乡原”者，是孔子深恶痛绝的。一直强调“君子”与“小人”的孔子，认为人的品德好是君子，不好是小人。此处，孔子并没有提到小人，而是只指出了“乡原”。这种情形证明“乡原”这种人是孔子所不可原谅的，孔子最排斥的，就连“小人”都比“乡原”略胜一筹。

“小人”在孔子看来，是有不到之处，但他们的品德不高尚，唯利是图的嘴脸完全表露无遗。其他人如果不愿被影响，会有所警惕、提防他们的阴谋

或企图。这类人无法压抑他们对物欲的需求，成了欲望的奴隶，是可悲又可笑的。

相比之下，“乡原”就显得不简单多了。他们的所作所为，让人们困惑不已。有些人也许觉得他们有些不对，但不知错在何处。更有些人会觉得他们与真正的“君子”是一样的。这是因为他们不得罪任何人，“君子”或“小人”都被他们所蒙蔽。“君子”觉得“乡原”是他们中的一员；“小人”则是因为“乡原”与他们同流合污，而把“乡原”视为同党。

如果让“乡原”混入社会中，将引起道德标准的困惑。人们将不知道哪个是对的，哪个又是不对的。这是因为“乡原”永远有办法满足大家的口味，使得“对”与“错”的界限模糊不清。

以下将引一段《史记》中孔子与其学生子贡及颜回的个别对话，来显示出孔子对“君子”原则的态度。孔子被困于陈蔡之间时，知道弟子间有愠心，对于他们的道无法被世人接受而感到困惑。因此他特意询问了其中几个弟子。在他们之中，子贡是这样回答的：“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汉]司马迁，1982，页 1931）孔子对他的回答这么回应：

“‘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汉]司马迁，1982，页 1931）

孔子有意探知学生们的志向与心态，因此故意询问了子贡的意见。子贡认为孔子的道非常大，不能被人们所接受，因此要求孔子把标准降低一些。孔子却告诉他，“君子”能做的是做好自己的本分，尽自己的责任，却不能担保

一定被别人所接受。他谴责子贡不修“君子”之道，却要求降低“君子”的标准，证明子贡的志向不够长远。

对于另一个学生颜回，他们之间的对话是这样的：

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

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汉〕司马迁，1982）

以上对话是紧接着孔子和子贡对话后进行的。孔子再次以同样的问题试探了他的得意门生颜回。《论语》里曾记载这么一段对话，“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雍也）（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论语注疏，1999，页 71）孔门如此多弟子，却只有颜回一人，是被孔子所认同是“好学”的。孔子对他的赞赏，由此可见一斑。颜回认为孔子的道非常大，所以世人不能接受。但这又如何，能够在别人不了解、不接受的情况下还能守着道，这才是“君子”的作为。如果自己没能够把道修好，是自己的不足处。如果自己是“君子”，却不能够为统治者所任用，那是他们的损失。就算不能够被他们任用又有什么关系，重要的仍旧能够守着“君子”之道。因为这才能显示“君子”的与众不同之处。孔子听了以后十分赞赏颜回的态度，而“欣然而笑”。

从孔子对子贡和颜回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知道孔子对“君子”的态度。子贡要求他把要求降低些，他即不满意子贡的态度，而说他“志不远矣”。反

观，颜回认为“君子”就是“君子”，没有所谓的降低要求，去迎合他人要求之理。孔子听了以后，“欣然而笑”。

孔子对待这两个学生的反应，能让我们明白他对“君子”的要求是一丝不苟的，达到即君子，达不到即不是。没有委屈求全，寻求世人认同之理。从这里，也可知道孔子对“乡原”这种人是绝无认可的道理的。“乡原”就是“小人”试图打着“君子”的旗帜，招摇撞骗寻求世人的认可与欣赏。以孔子对“君子”的要求，他不可能认同“乡原”这种表里不一之人。

第三节 孟子对“乡原”的态度

孔子在《论语》里并未对“乡原”做出深入的讨论。他只说明了如果一个人受到好人与坏人的拥戴，那么其中一定有值得质疑之处。他希望人们成为那种被好人所喜欢，被坏人所厌恶之人。

孟子的学生万章询问他“乡原”之错在何处。他是这样回答的：“何以为是嚶嚶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一）孟子注疏，1999，页405）

朱子对于这段原文是这样理解的：乡原讥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比称古人邪？又讥狷者曰：何必如此踽踽凉凉，无所亲厚哉？人既生于此世，则但当为此世之人，使当世之人皆以为善则可矣，此乡原

之志也。…孟子言此深自闭藏，以求亲媚于世，是乡原之行也。（[宋]朱熹，2011，页 351）

以上的引文里带出了“乡原”的处世态度。他讥讽以狂狷称世者，认为他们或效仿古人，或与世隔绝，无亲近之人。“乡原”者认为人既然生为当世之人，最重要的是当下让人们觉得他是好人就可以了，其他的都不甚重要。

这是一个证明“乡原”是“德之贼也”的重要论据。他们所着重的不是“君子”之道，也并非像“小人”般不惜牺牲名誉，只为物欲；他们要的是得到周遭人们的认可，博取一个好名声。怎么做并不重要，只要能够得到一个“善名”就可以了。这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伪君子”了。他们表面上似乎是君子，处处听从人们的意见，实则骨子里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这种沽名钓誉，假道学之徒，就是孔子、孟子所讨厌的“德之贼”了。

以下是孟子对“乡原”影响的描述。从而得知“乡原”这种伪君子是如何腐败人性和污染人心的。“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一）孟子注疏，1999，页 406）朱子对此作出了更为详尽的补充说明：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称，其言似义而非义也。利口，多言而不实者也。郑声，淫乐也。乐，正乐也。紫，间色。朱，正色也。乡原不狂不狷，人皆以为善，有似乎中道而实非也，故恐其乱德。（[宋]朱熹，2011，页 352）

孟子在解释时引用了孔子的话语，其中连举了六个例子，来告诉人们似是而非的可怕。莠，会使人混淆苗与草，从而耽误农作物的生长。佞，是不正

当的聪明法，看起来好像正义却不是。郑声与紫色，使人搞混正当的音乐与颜色。“乡原”表面看似文质彬彬，一派君子作风，似乎符合中庸之道但却是个伪君子。

孔子担心这样的人，混在人群里，会使人忘却了真正的君子作风，败坏了人性的正义。孔子因而严厉的批评了这种“伪君子”其实是“德之贼也”。他们实际上正在腐败社会里人们的良知，同时使人对真正的“君子之道”产生了困惑。

孟子曾引用孔子的话语提出：“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一）孟子注疏，1999，页406）朱子对其中的邪慝做出了说明，并进一步解释了“君子”的反经之道。朱子注：邪慝，如乡原之属是也。世衰道微，大经不正，故人人得为异说以济其私，而邪慝并起，不可胜正，君子于此，亦复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复，则民兴于善，而是非明白，无所回互，虽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宋]朱熹，2011，页352）而朱子所收录的其他人说法，尹氏则认为：“君子取夫狂狷，盖以狂者志大而可与进道，狷者有所不为，而可与有为也。所恶于乡原，而欲痛绝之者，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绝之之术无他焉，亦曰反经而已矣。”（[宋]朱熹，2011，页352）

邪慝，含有隐藏的邪恶之意。根据朱子的注释，此处的邪慝，指的正是“乡原”这种人。因为他们的罪恶不像小人般明显外露，而是深深隐藏起来的。狂狷者，较之“乡原”好得多了，因为他们至少还有志向，有所为与有所不为。反观“乡原”者毫无原则可言，他们见风就倒，行为似是而非，使人困惑，罪

大恶极。如果要杜绝这种人的横行，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回归正道，既“经道”，因此说“君子反经而已”。这是因为只有返归正道，才能杜绝“乡原”的不良影响。

第三章 乡原与儒家思想

“乡原”在儒家思想里的定位无一定标准。因为他们似是而非的行为，让人们不禁怀疑“乡原”与其他儒家思想到底有何差别。“中庸”、“权变”、“狂狷”是几个儒家思想主张的重要范畴。人们会时常把“乡原”和这几个范畴相提并论。此章欲讨论的就是这三种儒家思想范畴的概念，以及它们与“乡原”的差别。

第一节 “乡原”与“中庸”

人们时常把“乡原”和“中庸”相提并论。孔子与孟子到底如何看待“乡原”与“中庸”，以及他们之间的差别，是此处重要的讨论课题。

上文已阐述了乡原的起源与它的弊端。但却会引起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乡原与中庸到底有什么不同之处，若有则两者之间的差异到底大不大。孔子赞同中庸，并提倡中庸，却把乡原当作是道德的背叛者，故两者之间的关系值得探讨。

君子达到中庸的过程，即“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宋]朱熹，2011，页 36）朱子注：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笃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属也。（[宋]朱熹，2011，页 37）

在《中庸》里就说到君子之道，要问学，到广大处就能掌握精微，而到了极高明之处就能明白中庸之道。朱子的注解就进一步说明了中庸。达到了中

庸的境界，则不会因为自己的一丝一毫私欲而被蒙蔽了思想，进而做出错误的判断。而是能够融会贯通所学，掌握已有的知识，从而做出最适合当下的决定。这就是中庸的高明之处，但也是最难做到的一点。因为人要做到完全忘了自己本身几乎是不可能的。

“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中庸）（[宋]朱熹，2011，页 24）朱子注：不为索隐行怪，则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途而废，是以遁世不见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尽、仁之至、不赖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犹不自居也。故曰唯圣者能之而已。（[宋]朱熹，2011，页 24）中庸是儒家的最高境界。从朱子的“知之尽、仁之至”就可一窥门径了。要做到中庸不容易，达到以后坚持更难，就连孔子都不敢自称已经达到中庸了。如果半途而废，是不能够算数的。就连孔子自己也担心会一不小心，就失去了中庸之道，所以他说只有圣人才能持之以恒。

尽管“中庸”极其难以掌握，孔子还是举出了达到“中庸”境界之人。“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宋]朱熹，2011，页 22）朱子注：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间，言能守也。颜子盖真知之，故能择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宋]朱熹，2011，页 22）

颜回是孔子最赞赏的学生。孔子认为他已经达到中庸了，然而仍旧小心翼翼的，唯恐自己会失去它。由此可见，达到中庸是如何的难，且最难的在于如何保有并持之以恒。中庸最主要的是能够置身事外，不被自己本身的一思一念所影响。这才不会做出不符合仁义道德之事。

《中庸》里曾指出：“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宋]朱熹，2011，页 23）朱子注：国有道，不变未达之所守；国无道，不变平生之所守也。此则所谓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胜其人欲之私，不能择而守也。君子之强，孰大于是。（[宋]朱熹，2011，页 23）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流”。这是中庸的原则，不会沦落到同流合污的地步。“国有道”或是“国无道”就是现在的社会环境，即不管周遭环境或周围人们的态度如何，该守的就该守，绝无沦为应声虫，同流合污之理。

那么，中庸的态度或尺度到底在哪里？如何才能做到符合“中庸”但不沦为“乡原”有很深奥的道理。

“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论语注疏，1999，页 258）朱子对于这段引文的注解为：大德、小德，犹言大节、小节。闲，阑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节虽或未尽合理，亦无害也。（[宋]朱熹，2011，页 177）

这就是中庸的其中一个表现方式，最重要的道德操守是丝毫不可逾越的。次要的就可视情况而做出调整，这就是儒家所谓的“中庸”。然而“大德”或是中庸的原则到底是什么也许也是一个疑问。此处，就必须强调孔子的“仁义”了。孔孟的儒家的君子观，不外乎符合仁义。若已无法达到“仁义”，还是什么君子呢？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里仁篇）（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论语注疏，1999，页 50）《正义》对此解释

为“言君子于天下之人，无择于富厚与穷薄者，但有义者则与相亲也。”（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论语注疏，1999，页 50）

这是其中一个“仁义”的标准，也是“中庸”的原则之一。不被环境所影响，择善而固执之。中庸的体现即在于无视自身的荣辱，而在当时情形中做出最适合的决定，但其中的“大德”却不可忽视，这才是君子的最高境界。

中庸在一定范围内，允许人们做出调适，但这“一定范围”即以不违背“仁”为标准。“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论语注疏，1999，页 48）“言君子所以为君子，以其仁也。若贪富贵而厌贫贱，则是自离其仁，而无君子之实矣，何所成其名乎？盖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贵、贫贱、取舍之间而已也。”（[宋]朱熹，2011，页 69）

孔子说得十分清楚，如果离开了“仁”，那就不是“君子”了。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符合“仁”的标准。若一味的假借中庸的调适理论，而忘了“仁”，这就不是君子了。

以下将比较中庸与乡原，让两者之间的差别更加明显。此外，也要带出何以孔子与孟子会赞成“中庸”，但却反对“乡原”。

孔子在《中庸》中就很明确的说明了“君子”会喜欢中庸之道；反之，“小人”是反其道而行的。“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无忌惮也。’”（[宋]朱熹，2011，页 21）以上是中庸里的引文，而朱子对于这段引文是这么解释的：“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

有小人之心，而又无所忌惮也。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无时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则肆欲妄行，而无所忌惮矣。”（[宋]朱熹，2011，页 21）

在以上段落中，孔子就说明了“君子”与“小人”看待中庸的态度差别。中庸是“无定体”的，“随时而在”，没有一定标准却随时都存在，君子因而引而深深自律。时时警惕自己，深怕自己不符合“中庸”之道，但小人却会与“中庸”之道反其道而行。他们只追求自己想要的，进而无所不用其极，只为达到目的。自然而然的，也就无法达到“中庸”。由于他们走向了极端之道，丝毫不被道德规范所约束，所以只想着自己的需求。不似君子般，有诸多道德范畴上的顾忌，时时刻刻如履薄冰，唯恐做错了决定，而不符合“君子”之道。

“乡原”，即一乡人之愿，一乡之人的看法与喜好。以此为名的好好先生，即假道学，他采取多数人的看法，赞成他们的想法，以迎合他们的喜好。在过程中，他没有考虑道德上的“该”与“不该”，而只是顾及了自己的名声，希望博取一个老好人的名誉，也就成了“伪君子”了。

中庸是在一定尺度内，让人们能够做出调整，不墨守陈规。在当时的情形下，做出最适合又符合“仁义”的决定。虽然有调整的余地，但凡事不离“仁义”的标准，以维持一个君子的身份。因此，“中庸”是君子的最高境界，“极高明而道中庸”，而“乡原”这种假借“君子”名誉，冒“中庸”之名之徒，就只能沦为“德之贼也”了。

第二节 “乡原”与“权变”

朱熹的老师程子曾经提出，汉代的儒家们误解了儒家思想里的“权变”，使之成为了权变权术，扭曲了孔子的原意。朱熹从中提出更透彻的理解与说明，使后人不致失去了明白“权变”真意的机会。

“程子曰：汉儒以反经合道为权，故有权变权术之论，皆非也。权只是经也。自汉以下，无人识此字。”（[宋]朱熹，2011，页 110）

权，其实也只是“经”。只不过是让人们有稍微调试的空间，不至于呆板、墨守成规而已。它绝非是让人有乘机乖离“经”的机会。

在孔子看来，“权”是个非常难掌握的道理。因为一不小心，就容易让人乖离了“经”而不自觉，尚自以为符合“权变”而引以为傲。而一旦不符合“经”，却一味讲求“权变”，则容易陷入“乡原”的地步。

关于“权”这个课题，孔子曾说过：“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以立，未可与权。（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论语注疏，1999，页 122）何晏对此的解释为：“…虽能有所立，未必能权量其轻重之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论语注疏，1999，页 123）

可以一同学习，但未必是同道中人。因为往往意见不合之人就无法接受他人的见解。就算拥有共同的志向与见解，也未必真正能够实行，即“立”。因为明白与实际上做到是两回事。而就算做到了，也未必符合“权”的要求。

很可能一味追求“经”，而无法随着环境而做到“权”的调适。在共学，适道，立，权四个步骤里，孔子把“权”放在了最后。前三者都是“权”的前提条件，且达到三者后也未必符合“权”。可见孔子对“权”的慎重性。

孟子就孔子提出“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补充。他认为“权变”是十分灵活的，是要依据情况而酌情做出调适的。“执中无权，犹执一也。”

（尽心章）（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一）孟子注疏，1999，页 367）赵岐对此解释为“如执中而不知权变，但若执一介之人，不知时变者也。”（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一）孟子注疏，1999，页 367）

孟子在此处就提出了如果一个人持节“中庸”，那他当然比不愿意拔一毛可利天下的杨朱好，也比为兼爱世人而摩顶放踵的墨子好。如果只口头“执中”，而不明白权变的重要性，那和只执重一段之人无差别了。这也是为什么孟子强调所谓的“执中”，必须是与时并进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弹性且可变化的。

“执中”而且要懂得“权变”是儒家的最高理想。但“权变”的范围又在何处，要怎么做调适才不会变得滥用了“权变”的方便？孔子对于祭祀所使用的服饰如此认为：“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子罕）（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论语注疏，1999，页 112）程子就对此行为提出了见解：“君子处世，事之无害于义者，从俗可也；害于义，则不可从也。”（[宋]朱熹，2011，页 105）

为了节俭而省略了祭祀用的礼服，孔子可以接受。当在朝堂上参见君主的时候，多数人在堂上拜见君主，孔子却提出了异议。他坚持要在堂下拜见君

主，即使没有人支持他这样做，他依旧坚持如此。如果臣子养成了在堂上拜见君主的习惯，久而久之会有傲慢的心态，忘了君臣的尊卑，是故孔子坚持为臣之礼。

程子为此提出了更详细的解说，他说君子处世，如果是那些无伤大雅而不损害

仁义道德之处的行为，是可以顺从一般人的。然而如果顺从了他们，就会不符合仁义，那就万万不可行这个方便了。

故此，可看出“权变”也是有条件必须要遵守的，而非一味顺从他人。

“经权”的思想是基于仁义道德而建立的。由所处的情况下，对“经”进行适当的调整，对平时坚持的原则变通，酌情衡量，是谓“权”。一个人如果达到“中庸”的境界，那他就可以很好的拿捏“权变”的尺度。然而，如果没有“中庸”的程度，那运用“权变”时就会沦为“权术”了。这是因为他还未掌握“权变”的尺度，不能够了解其中的界限在何处。职是之故，可得出结论即达到“中庸”者即能掌握“权变”，只懂得一味“权变”却不了解“中庸”者，则容易沦落为“权术”，把“权变”当作方便而不自知，还以为自己在遵守“权变”的原则。“权变”的基本原则是“仁义”，但是由这个基本原则而延伸出来的人事关系则随着不同的人、事、物而必须有所更动，故此行事尺度就取决于个人的智慧与修养。

“乡原”处世态度，只是为了博取众人的欢心，而随时做出调整。做事情毫不顾虑所作所为是否妨碍了仁义，且调整时毫无原则可言。他们只是为了名誉而活，盗取“君子”的一些主张，看似君子，但骨子里却并非像君子般的

思想，而是只做了表面功夫。“权变”是有条件的，它的衡量必须基于“仁义”的基础上，超出了仁义，就不是“权变”，而是玩弄权术了。“乡原”衡量的标准却只是针对自己的利益而言，如果能够对自己的名誉得到最大的好处则毫不犹豫的做出改变，根本不是为了“仁义”。我们因而可以得到结论，即“乡原”与“权变”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第三节 “乡原”与“狂狷”

“狂”与“狷”是儒家里，对其中两种人的称呼。孔子认为他们虽然达不到儒家的“君子”要求，但也是尚可接受的，是以他愿意与他们来往而不介意。

孔子曾经这样表示：“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论语注疏，1999，页179）朱子对狂狷者的解释是这样的：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余。盖圣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谨厚之人，则未必能自振拔而有所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犹可因其志节，而激励裁抑之以进于道，非与其终于此而已也。（[宋]朱熹，2011，页138）

狂者，是那些志向很大，但实际上却做不到之人。狷者，是那些明白分寸，有所为与有所不为之人。孔子意欲寻找遵循“中道”之人，无奈却找不到。他因而降低眼光，把目标放在“狂狷”这种人身上。因为“狂狷”者，具备了君子的基本条件，只需要抑郁他们过高的志向，激励他们守节之处，那么影响他们成为真正的君子的机会还是有的。是故孔子认为如果找不到“中庸”之人，“狂狷”之人还是可以接受的。

孔子难道不想找合乎中道的君子吗？怎么他降低了要求，去考虑那些狂狷之人呢？孟子对孔子的行为如此解答：“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尽心）（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一）孟子注疏，1999，页 405）赵岐对此段引文的注解为：“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进取，狷者能不为不善。时无中道之人，以狂、狷次善者，故思之也。”（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一）孟子注疏，1999，页 405）

孔子并非是不想和那些真正的君子来往，而是符合真正“君子”之道的人太少了。狂者至少还思进取，以达到更好的境界；狷者知道不该做些什么，而不会太过分。是故，他们是“善”以下最好的境界了，所以孔子能够接受并希望影响他们，进而成为真正的“君子”。

对于为何给予“狂狷”者这样的称号，孟子是这样回答的：“何以谓之狂？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一）孟子注疏，1999，页 405）而赵岐的解说则更清楚些：“嚶嚶，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考察其行，不能掩覆其言，是又狂也。…既不能得狂者，欲得有介之人，能耻践恶行不洁者，则可与言矣。是狷人次于狂者也。”（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一）孟子注疏，1999，页 405）

志大言大，言过其实，但仍思进取，故可嘉奖。考察他的言行，发现他并不能真正的实践所言，所以是狂者。然而，他们思慕古人，想要学习古人，所以孔子喜欢他们的这一点。如果狂者也得不到，那么那些至少懂得礼仪廉耻

的人，就像狷者，也是可取的。他们虽然不思进取，但至少懂得不该做那些逾越礼节之事。由此可看出，他们是狂者的次一等人，名为狷者。孔子与孟子明白他们的本性并不坏，只是所作还不够，不足以成为真正的“君子”。无论如何，他们是仍旧有希望的一群，依然是孔子所期待成为“君子”的“好人”，因此孔子不愿放弃他们。

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乎！乡原，德之贼也。’（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一）孟子注疏，1999，页405）孔子对狂狷者，依旧怀有期望，唯独对“乡原”恨之入骨。他一点不遗憾没有与“乡原”接近的机会。由此可见，在孔子眼里，“君子”是最高境界，次之为“狂狷”，最下等的是“乡原”。他认为这种人已经不可救药了，距离“君子”的标准实在是太远了，因此他丝毫不眷恋这种人格，而且给了“德之贼也”这么严厉的批评。“狂狷”虽然不是君子，但仍旧有“君子”的基础与一些风范，但“乡原”就完全不是君子之风了。他们只重名誉，不似狂者般思进取，也不似狷者般能知礼仪廉耻。

“乡原”者窃取“君子”的一些行为，套上“小人”的动机，使用在群众中，使人看不清他们的真面目。那些从“君子”偷来的行为，他们冠冕堂皇的使用在自己身上，但却不是为了实行“仁义”，而只是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君子”，便宜行事。所行之事，无非就是符合大多数人的愿望，迎合他们的意见，但大多数人的意见，却未必就是对的。有时候人们容易被假象迷惑，而做出错误的判断，或更为严重的是，三人成虎，越多人认为是这样的，那事情就成了另一个样子，距离事实可能差得很远，

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君子，就会站出来主持正义，提醒人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是因为是非是不能被混淆的，但“乡原”根本不会那么做，因为他们不想冒着被他人讨厌的风险，而去争取对自己没有利益的事情。于是乎，“乡原”只是一群寡廉鲜耻，借着“君子”的称头，实则行“小人”之事的小人而已。

第四章 乡原之影响

对于孔子或孟子而言，乡原明显是会对社会及人性造成不良影响的。同时，他们也明确地表明了对这种伪君子的负面看法。简言之，是十分不喜欢且厌恶的。由于在《论语》中，孔子并未多着墨于这类伪君子，因此此处要探讨的是《孟子》里对“乡原”的影响。另外，“小人”与“乡原”同时都是儒家所否定的。然而，究竟“小人”与“乡原”有何差异，也是此章节欲探讨者。

第一节 “乡原”与“小人”

延申第二章第三节孟子对“乡原”的影响说，从彼此对社会的影响角度，窥探出“乡原”与“小人”之别。首先，先看看几处《论语》里提到的“小人”表现。他们所显示出来的形象到底是怎样的。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宪问）（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论语注疏，1999，页195）在刘宝楠所收集的众家注疏里，皇疏：上达者，达于仁义也。下达谓达于财利，所以与君子反也。（〔清〕刘宝楠，1990，页585-586）

下达，说的是财物利益或是物欲方面的贪欲。小人就是极力贪取这一方面的利益，为此孜孜不倦，极力耕耘。从这里，可看出“小人”表现出来的一面是贪婪的。若把“小人”和“乡原”做比较，则已可看出不同。“小人”追求的是物欲，可“乡原”追求的却不只是财物上的利益，他们还追求一个好名

声，需要得到大家的认可。这也是为什么“乡原”是不会露出一副贪婪的嘴脸的，因为他们必须维持一副道貌岸然的表象，来迷惑众生。

关于所求的对象为何，孔子这么认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卫灵公篇）（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论语注疏，1999，页 214）孔颖达的正义是这样解释的：此章言君子责于己，小人责于人也。求，责也。诸，于也。（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论语注疏，1999，页 214）

《孟子》里则提出“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离娄）（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一）孟子注疏，1999，页 192），这是“君子”的处世态度，凡事若有不顺心之处，当反求诸己。扪心自问，是否自己有做不到之处，然后才来分析情势。而“小人”则相反，处处都先指责别人。都是他人的错，自己是不会有错的。

这是第二个“小人”与“乡原”的不同之处。为了摆脱责任，一旦有事情发生，“小人”会先指责他人，来推辞自己的责任。可想而知，这种人怎么会得到大部分人的喜欢，推卸责任，指责他人是“小人”典型的特征，也是他们不受喜欢之处。但“乡原”者却不会这么做，他们要的是好名声，好赞誉，是不会做出这等如此不讨人心的举动的。故也可看出两者的差别之处。若承认错误，不会带来损失，反而能够赢得坦承错误，洗心革面的好名声，“乡原”者是愿意这么做的。这就是他们与“小人”的差别。

《论语》里说过君子与小人对他人态度的差别：“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论语注疏，1999，页 165）正义曰：此章言君子之于人，嘉善而矜不能，又复仁恕，故成人之美，不

成人之恶也。小人则嫉贤乐祸，而成人之恶，不成人之美，故曰反是。（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论语注疏，1999，页 165）

隐恶扬善，是“君子”的所作所为。他们极力宣扬嘉奖人们“善”的一面，而以宽厚仁恕之心看待“恶”的一面。与之相反的“小人”却无法忍受别人高兴快乐的时光，时时刻刻想着如何中伤他们，以毁去他们的快乐。故孔子说君子成人之美，而小人反是。在这里，“小人”所表现出来的面目是妒忌别人，恶意中伤，成人之恶。

这是“小人”与“乡原”的另一个不同之处。为了博取好名声，并获取人心，他们竭尽所能的讨好人们，说些谄媚的话。这么做看似“成人之美”，实则是为了一己私欲。从表面上看来，他们似乎符合“君子”之道，但骨子里却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如“小人”般卑鄙无耻。

在看过了以上的例子后，可为“乡原”的定位做个小总结。“乡原”是出于“君子”与“小人”之间的灰色地带。他们不似真正的“君子”般坦荡荡，又比嘴脸毕露无遗的“小人”显得隐藏得多。这种人的城府极深，他们不是真正的“君子”，也不是利欲熏心的“小人”，而是比“小人”更加可恶的一种人。

“君子”是人们学习的典范，“小人”是大家的反面教材，能够以他们为鉴，引而律己，时时提醒自己不可沦为像他们一般。“乡原”的存在，却使人们困惑了，不知道他们是真正的“君子”，还是“小人”。这种似是而非的行为，让人不知该赞同还是谴责。

在一个社群里，人们十分容易被身边之人所影响。故此，孔子十分注意一个人的品德操守，因为他它只是个人的修养，还会影响周遭之人。“君子”是大家所向往的崇高境界，会使人心生模仿、进而提升自己的涵养。“小人”则被人们所谴责，警戒自己不可像他们一样的卑鄙。“乡原”那种混淆视听的做法，却让人不知该学习还是谴责，没有一定的评论规范。如果别人受到“乡原”的影响而忘了真正的“君子”涵养，是十分糟糕的情形。探讨到此处，也可稍微明白为何黑白分明，是非对错清楚的孔夫子如此痛恨“乡原”，而称他们为“德之贼也”了。

第二节 “乡原”与“君子”

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讨论过“乡原”的特质，他们绝不可能是“君子”的表现。至于“乡原”与“小人”的差别也已经论述了。此处欲探讨的是“乡原”与“君子”在面临大节时会做出怎样的抉择。从他们做抉择的差别中，进一步探讨“乡原”与“君子”最大的不同之处。

“乡原”这种假道学，为了获取名利，会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他们的所作所为，有者与“君子”相似。这种情形让人们在分辨“乡原”和“君子”时面临了不小的困难。然而，假的就是假的，永远也成不了真的。“乡原”与“君子”的行为相似，然则行事动机却相反。“君子”是为了“仁义”，“乡原”则是为了“名利”。

在平时的太平岁月里，“乡原”不会面临什么重大的考验。当群体或是国家面临危难时，人们就可以乘机揭开“乡原”的真面目了。《论语》里曾指

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篇）（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论语注疏，1999，页210）《孟子》里也曾指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篇）（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一）孟子注疏，1999，页308）由此可见，真正的君子是会为了“仁义”而牺牲生命的。一心为了名与利，处处为己的“乡原”就无法做到这一点了。若他们能够做得到，那他们就不是“德之贼也”，而是真正的君子了。

我们可以从是否能够“杀生成仁”看出“君子”与“乡原”的差别，但“乡原”为何做不到“舍生取义”是值得讨论的。前面的章节里，已经得出结论，即“乡原”是一群为了保护名声或明哲保身的一群人。对他们而言，只要赢得世俗之人的赞赏，就是人生里了不起的成就了。“君子”把“仁义”摆在第一位，同时兼顾群体与国家的利益。“乡原”则与“君子”不同，他们不会认为“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是他们的责任。这是因为在他们心里，个人的生命最重要。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时，当取熊掌，因为熊掌更稀有，更重要。对“君子”来说，“仁义”就是熊掌，“生命”是鱼，他们宁愿“舍生取义”；然而，“乡原”却认为“生命”是熊掌，因此他们不愿为了“仁义”而放弃最重要的“生命”。“君子”是圣人眼中的境界，“乡原”却是凡夫俗子为了自我而表现出来的行为。

从几个角度出发来看，我们可以从细节去探讨“乡原”的特质。然而，动机与目的究竟是有些抽象且值得争议的课题，但是能否牺牲生命去完成“仁义”，却是一个不容人狡辩或混淆视听的壮举。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泰伯篇）”（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论语注疏，1999，页 103）

当面临大节挑战时，“乡原”与“君子”的差别，就昭然若揭了。“君子”是“临大节而不可夺也”，“乡原”则永远也达不到“君子”的这一个境界。披着羊皮的狼永远也成不了真正的羊，因为他们的狼爪与狼牙会阻止他们试图真正的融入羊群中。探讨到此处，我们也庆幸“乡原”并非没有被揭发的时候。假的“君子”在再么装扮，也永远成不了真的“君子”。

结语

孔子认为人们应该彻底的实践“君子”之道，一切原则都须彻底的执行，不是有者可遵循，有者可倾向自己的喜好。孔子就曾对他的弟子子夏说道：“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雍也）（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论语注疏，1999，页76）刘宝楠对“君子儒”与“小人儒”做出了这样的解释：君子为儒，将以明道；小人为儒，则矜其名。”（[清]刘宝楠，1990，页228）

孔子于此处说得十分清楚了。他让子夏要做一个君子般的儒者，以能够弘道。如果想小人般想假意模仿儒者的话，就是像“乡原”般的伪君子了。他们以儒称名，只是想藉此得到名声而已。作为“君子”，当分清楚是非曲直，黑白分明，若不辨是非，空有儒者之名而无儒者之实，那就是“小人儒”了。这也就是所谓的“乡原”、“伪君子”、“假道学”了，而这种类型的人是最为孔子所唾弃的。更不堪的是，他们连小人都比不上。小人并非不求名，但“小人”至少不掩饰自己是“小人”，他们的面目与目的一目了然，不似“乡原”般，如披着羊皮的狼。

在以上章节里所讨论的项目里，已经阐述了“乡原”的特质，以及他们儒家精神的出入。“中庸”、“权变”与“狂狷”表面上似乎与儒家“经道”相违，因为他们允许在非影响大节的情况下更动，做出调适。然而，前面已经讨论过了，他们实际上还是遵守儒家的“经”与“仁义”的精神。不管如何更动，都不会超出“仁义”的范围，有些大节是不可改变的，小节则能够。这不是因为“君子”随着自己的喜好而做决定，而是有些时候，在情况不允许之下，需要通融做些改变。然则，改变不能不符合“正道”，否则就成了“随便”。

“随便”这种态度，就是本论文所论述之“乡原”的态度。“乡原”者随意更动标准，毫无原则。只要能够获得最大的利益，就随时改变立场迎合他人。他们的作为与君子似是而非，看似正道，实则不然。窃取“君子”的德行，然后让自己能够方便行事，得到最大的收获，因此孔子评论他们为“德之贼也”。

“小人”与“乡原”都追求名利，但是两者之间的轻重比例是有差别的。“小人”求“名”但更求“利”，因为“名”与“利”向来都是唇齿相依的。如果能够获取利益，还能够维持好名声，何乐而不为之？但是“小人”在如果不能兼顾二者的情形下，会选择先着重“利”，“乡原”则反之，他们较注重表面上的“名”。然则，若是遇上大节，“乡原”就无法像“君子”般杀身成仁了。这是因为“乡原”并非只是求“名”不求“利”，当情况实在是危及自身利益的时候，他们也会露出真面目以保性命的，这也是为什么人们还能够有机会揭发他们的真面目，而不是永远被假象所遮蔽。

从中，我们可得出结论，即“小人”和“乡原”都是为追求名利而活的。然而，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在过程中所采取的手段，以及最注重的是“名”还是“利”就有偏差了。此中的偏差程度到底在何处，标准在哪里，则仍是一个未知数，不为人们所知。

在经过了分析与阐述之后，我们可看出“乡原”的真面目。他们与儒家思想差得天高地远。甚至在孔子看来，丝毫无可取之处。故可做出结论，“乡原”是“小人”中的“小人”。他们比普通的“小人”还更被“君子”所厌恶，是儒家思想里，最底层的道德标准代表。

参考文献

引用古籍

1. [清]焦循撰（1987），《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
2. [清]刘宝楠（1990），《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
3. [汉]司马迁（1982），《史记》北京：中华书局。
4.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1981），《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5. [宋]朱熹（2011），《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

引用专书

1. 程俊英、蒋见元（1991），《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2. 曹建国、张玖青注说（2008），《国语》，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
3. 费正清编（2008），《中国的思想与制度》，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4. 郭沫若（1984），《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五卷：管子集校》，北京：人民出版社。
5. 李学勤主编（1999），《十三经注疏（十）论语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6. 李学勤主编(1999),《十三经注疏(十一)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7. 李零(2008),《去圣乃得真孔子——〈论语〉纵横读》,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8. 余英时(2004)《余英时文集(第二卷):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9. 张传玺主编(2004),《中国古代史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期刊论文

1. 葛荃(2008年11月(第29卷/第6期)),〈作为政治人格的狂狷——乡愿与伪君子〉,《东岳论丛》133-138。
2. 熊燕华(2007),《孔子君子观探析》,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